

# “《尚书·康诰》篇首四十八 字错简说”考辨

## ——兼论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

李大用

“周的王业，是在周公东征和营建东都以后，才巩固起来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尚书·康诰》为研究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提供了直接史料。可是，自从宋苏轼明确提出：《康诰》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句读从周秉钧《尚书易解》）四十八字“皆《洛诰》之文，当在‘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余民封康叔；七年而复辟，营洛在复辟之岁，则经文明甚；则封康叔之时，决未营洛。又此文终篇初不及营洛之事，如简策脱误也。”（《东坡书传》）虽然宋林之奇指出：“某尝谓苏氏之说经多失之易，易则己意之有所不安者，必改易经文以就之。如此则经文之本文其存者几希，非慎言阙疑之义也。”并提出：“此书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然后继之以诰康叔之事，盖封康叔在于卜洛之前，而诰康叔在于营洛之际。”

（《尚书全解》）宋金履祥更提出：“此叙《洛诰》亦未协，当是《梓材》之叙。”（《尚书表解》）但因林氏从表面上看以《康诰》作于“营洛之际”的说法，顺了经意，实际上与苏氏“七年而复辟，营洛在复辟之岁”的说法一致。金说乃兼取苏氏

以《康诰》之叙为《洛诰》之叙，与宋吴棫以“《梓材》为营洛之书”（《书稗传》）两家之说及朱熹之意而成，同样认为《康诰》篇首四十八字属于营洛之时。可见，宋代三说，不管是“易经文”以顺“己意”，还是改著作时间以顺“经意”，都是为了说明周公营建洛邑于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时。因此，从朱熹、蔡沈的《书经集传》、杨简的《五诰解》到元陈栎的《尚书集解纂说》，清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都同意苏说。影响所及，至今的《尚书》专著，如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张西堂的《尚书引论》、王世舜的《尚书译注》，以及李民的《尚书与古史研究》、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王宇信的《西周史话》等历史著作，特别是有关周公营建洛邑的论文均沿用苏说<sup>①</sup>；因而，对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作出了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论述。为此，特对苏说加以考辨，并结合《尚书·召诰》、《洛诰》、《周易·益》卦爻辞和《何尊》铭文等，对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作些探索，以资参考。

## 一

我们先根据《尔雅》、《说文》、两汉训诂和今人论著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加以注释，以了解其本意。（1）《尔雅·释诂》：“哉，始也。”月初生为魄，马融曰：“魄，朏也，谓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朏，指月光。（2）《说文》：“初，始也。”（3）《尔雅·释诂》：“基，谋也。”（4）作：兴建。《诗·大雅·文王有声》：“作邑于丰。”（5）侯、甸、男、采、卫，九服之五也。侯甸男邦，侯服、甸服、男服之邦君。《孔疏》云：“言邦，见其国君。”（6）《释诂》：“工，官也。”采卫百工，采服、卫服之百官也。（7）播民：播迁之民，谓殷之遗民也。《汉书》颜注：“播，

迁也。”（8）《周书·谥法》：“和，会也。”（9）《诗传》：“士、事也。”事于周，谓作洛邑也。（10）《释诂》：“威，皆也。”“勤，劳也。”（11）洪，郑玄曰：“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诰。”意译为：三月初，周公在东方的洛邑开始谋划兴建新的大都市，四方人民都到这里集合。侯服、甸服、男服之邦君、采服、卫服之百官、殷之遗民均来会见，效事于周。周公慰劳之余，乃代成王大诰康叔以治道。可知，以上四十八字乃史官叙事之辞，记周公作诰之时、地、事与有关人物。

再看两汉经师、晋、唐儒臣对此篇首解说之异同，以探索苏说之渊源。

郑玄曰：“此时未作新邑。基，谋。歧，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隆平已至。”（《尚书疏》）

伏胜曰：“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而封康叔。”“周公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尚书大传》）

可见，两汉今、古文经师一致认为：周公于摄政四年三月初，“建侯卫而封康叔，”并开始谋划兴建洛邑。

不料，晋梅賾却伪托汉孔安国一反旧说，提出：周公于“摄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东国洛汭，居天下土中。”唐孔颖达又进而发挥曰：“知周公摄政七年三月者，以《洛诰》即七年反政而言营新邑及献卜之事，与《召诰》参同，俱为七年；此言作新邑，又同《召诰》，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书传》云：四年建侯卫而封康叔，五年营成洛邑，六年制礼作乐。《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颁度量而天下大顺，又云六年制礼作乐，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礼记》后儒

录，《书传》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尚书注疏》）

他们为什么要把周公建侯卫而封康叔、谋划兴建洛邑的时间从周公摄政四年三月初，改为周公摄政七年三月十六日？原来，“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说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sup>②</sup>当时，封建王朝统治者及其儒臣，鉴于王莽托周公、曹操托文王以夺两汉政权，于是依据孔子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周公“宪章文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等言论，以及孟子之“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的论点，倡言文王不称王，周公未代王，以提倡“君臣之义”。所以，虽然造伪的破绽不少，在历代王朝的推动下，《伪孔传》却风行起来。后来，孔颖达又依唐太宗意，为《伪孔传》作疏；从此，《尚书注疏》“颁之国胄（国子），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皮锡瑞《经学历史》）

可见，《尚书注疏》把周公建侯卫而封康叔、开始谋划兴建洛邑的时间，由“摄政四年”改为“七年反政之时”，是为了避周公代王之疑；把“三月初”改为“三月十六日”，则为与《召诰》、《洛诰》中召公、周公“相宅”、“卜宅”的时间相一致。

自欧阳修倡言“《周易·系辞》非圣人作，《诗序》非子夏作，其序多失”后，宋朝的辨伪之风非常盛行，王安石、程颐、苏轼、朱熹等人，“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疑《春秋》”<sup>③</sup>；而且，吴棫、朱熹已疑及《伪孔传》。但因受理学“道统”思想之束缚，却又往往“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甚至“变易事实以就其说。”<sup>④</sup>所以，不仅难对《伪孔传》一疑到底，反而补苴、发挥了文王不称王、周公只摄政、未代王的说法。苏轼之说就是这种



情况的产物。

因为，当年孔颖达对“周公既三年灭三监”，何以“七年始封康叔”之疑问，还能以“则于其间更遣人镇守，自不知其名字耳”来强解；但对两汉时已公认的“哉生魄”为月二日或三日，改为“月十六日”，却没法说清，成为悬案。苏轼则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与全文不吻合，应归之《洛诰》之叙的说法，从形式上解决了问题。因之，不仅得到赵简、朱熹、蔡沈等人的响应，就连表面上不同意苏说的林之奇、金履祥，也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了周公建侯卫而封康叔、开始谋划兴建洛邑于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时。

因而，至今多数学者还据此说明周公营建洛邑的时间。例如，史为乐就认为：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未即二十一日，成王为了营建洛邑，由镐京来到丰京向宗庙告祭，接着便派太保召公先去洛邑查看筑城的地点。三月戊申即初五日，召公到达洛邑，指挥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度城郭、郊庙、朝市的位置，到了寅卯即十一日规划成功。次日乙卯，周公也到达洛邑，普遍巡视了新邑的规划，并且进行了占卜。占卜的结果，在涧水东、瀍水西和瀍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邑都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成王，得到成王的批准后即正式动工兴建，当年年底洛邑建成。”从而引发了周公营建洛邑，“摄政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当年年底建成是否可能的新疑问。因为，据《逸周书·作雒》记载说：“城方七百二十丈（即所谓城方九里），而郭则方七十里（疑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而城中之建筑则有“五宫、大庙（太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楼台殿阁，均具备有“四阿、反玷、重亢、重郎、复格、藻梲……”，通路则有“内阶、玄阶、应门、库台……”等等。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其富丽堂皇，虽不必尽为实录，但其工程肯定是够浩大的，

绝对不是九个月可以完成的”。<sup>⑤</sup>

可见，苏说之失，在于忽视周公东征后的严峻形势和营建洛邑的目的，完全按主观意图裁剪历史，因而歪曲了历史，造成了千年的混乱。为此，我们必须如实了解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恢复历史的真相。

## 二

营建洛邑，是周武王开始规划的。《左传》桓公二年中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其意图很明显是以洛邑为周之新都。《逸周书·度邑》有一段文字，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周本纪》，更明确地提到武王临终前，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与周公讨论在洛邑建都的问题，甚至于睡不着觉。周由老根据地岐下而经文王迁丰（今陕西户县东）、武王迁镐（今陕西省长安西南），步步东移，在当时是为了夺取政权的需要。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又进一步计划迁都洛邑，无疑是为了便于对新拥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1964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载武王告天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唐兰译为：我建都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人民。正说明武王的决策<sup>⑥</sup>。

不料武王克殷后，才两年就死了。他死之后，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传子诵，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内有管、蔡，包藏祸心；外有武庚、徐、奄，不忘复辟，形势十分严峻。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公旦不畏人言，“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荀子·儒效》）。管叔、蔡叔等贵族不满。武庚乘机串通管叔、蔡叔，联合东方的徐、奄和一些部落、小国，一同起兵叛周。周公领兵东征，经过“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尚书大传》）的三个阶段，历时三年，最后取得完全胜利。周王朝的势力达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

东征的胜利，使周人在更大的领域内以更巩固的方式建立政权，不仅成为必要，也具备了可能。周公在这方面适时而成功地采取了措施，那就是“四年建侯卫”（《尚书大传》）。其主要内容是：“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同时，“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武王弟）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卫康叔世家》）还割取殷畿内地和新征服的奄国土地和人民封鲁公伯禽（周公之子）；并将新征服的薄姑氏土地和人民封给了齐太公之子吕伋。这样一来，既把姬周王族封在殷地，使周王朝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有了新的布局，又把殷余民分割在各个封国治理，从根本上解决了武王以来的殷贵族复辟的问题。

武庚联合管、蔡和东夷叛周，也使周公更加认识到加强中原地区统治的重要性。东征胜利之后，周公在“建侯卫”的同时，“如武王之意”（《周本纪》）兴建洛邑，以便对殷顽民和新拥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因为，正如清王夫之所说：“东郊之民心尚摇摇而未定，西望而狐疑，曰：天子其边徼我乎！惟正天邑之名于洛邑，而惠此仇民，服在王廷者，无疏远之嫌，夫乃思媚而危疑允释。义以纠之，仁以联之，丕诚殷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公之权也。”（《尚书引义·召诰》）所以，周王朝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是：“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于止。”（《尚书·多士》）即分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勉励他们努力治理，以利用他们，要他们顺从而服役。可见，周王朝是在东征胜利，周公建侯卫、营洛邑以后，才巩固起来的。所以，《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的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仅如此，《周易·益·晋》卦爻辞，还为以上论述提供了可靠的论据。请看《益》卦爻辞：“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

无咎。”（1）大作：大兴土木。此“作”同《康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之“作”同。（2）《礼记》郑注：“元，大也。”

（3）《说文》：“咎、灾也。”爻辞意为：大兴土木，兴建洛邑，于我大吉，无有灾祸。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1）中行：“当为人名，疑即仲衍。仲衍乃微子启之弟。《史记·宋微子世家》：周公即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国于宋。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

（高亨、唐兰说。）（2）公：周公。（3）从：听命。（4）依：金文和古文均读为殷。《康诰》郑注：“衣读为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5）《周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集解》引宋衷曰：“开国为析土地以封诸侯。”爻辞意为：仲衍告公，听命于周，迁国于宋，以代殷后。

再看《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1）康侯：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文中据西周青铜器铭文考证，指武王弟康叔封，封于康，所以称康侯。于省吾、唐兰、李镜池、高亨等均同此说。（2）锡：古通赐，锡马指成王、周公赏赐给康侯之良马。（3）蕃：古通番，指外族。（4）庶：古指人民。（5）昼日：一天。（6）接：交战。卦辞意为：身骑王赐马，率领殷士兵，康侯征东夷，一日三交战。

《益》卦爻辞并叙周公谋划营建洛邑，封微子于宋两件事，说明两事同时。而据《管蔡世家》记载：“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继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康叔。”则封宋、封卫确为同年。

《晋》卦卦辞和《沫司徒遽簋》铭文：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唐兰译为：“王来征伐商邑，命康侯在卫地防守边境。证明《逸周书·作雒》所叙“俾康叔宇于卫”，是在东征

“三年践奄”后，让康叔在卫地防守边境，镇压殷“多士”。为了统治殷顽民，还编成以康叔、中旄父等周贵族为统帅的“殷八师”，以安抚殷贵族、以殷治殷。为此，周王朝必须在洛邑兴建城郭、行宫、官署和宗庙，以作大军防守、安居周贵族和周王朝重臣、君王视察之用。所以，洛邑又有“洛师”之称。（《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可知，周公“俾康叔宇于卫”和“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乃同时之事。以上事例可证周公谋划营建洛邑与封康叔于卫均在东征胜利后的摄政四年；郑玄所说“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隆平已至”也基本属实。由上可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所叙符合历史实际。

与此同时，周公针对“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言今民不静，其心未定，屡导之犹未和同）的严峻形势，还谆谆告诫康叔，史官记之，谓之《康诰》：一段言文王、武王尚德慎刑，二段言尚德保民，三段言谨用刑罚，四段言用德化民，五段言听从教命。全篇记载既合情理，又符事实，决无辞意不达之处，篇首四十八字与全文内容吻合，决非《洛诰》脱简；郑玄、伏胜之说有依据，“伪礼”、苏轼之说不属实。（参见周秉钧《尚书易解》）。

### 三

营建洛邑的时间，《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而《洛诰》记载则明明说是在周公还政成王之时，即所谓“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说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伪孔”、苏轼主此说，故谓《康诰》篇首四十八字是《洛诰》之叙。那末，营建洛邑到底是始于何时呢？这个千年疑问，随着对苏说的考辨和周公营建洛邑目的之明确，特别是《何尊》的出土，才得以解决。请看《何尊》铭文：

唯王酈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



王诰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逮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唯王五祀。

关于“唯王五祀”，多数学者均考证为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摄政五年。但对“酆”字却提出了“迁都”（唐兰）、“相宅”（张政烺）、“筑城”（马承源）、“徙居”殷余民（李民）和“践祚”（杨宽）等五种解释<sup>⑦</sup>。结合《康诰》周公摄政四年，在“建侯卫”的同时，“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的记载，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之分析，以及《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来分析，我认为马承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书中的意译：“王开始营造成周，对武王举行了丰福之祭。四月丙戌这一天，王在京室对宗小子告诫说：从前你已故的父亲公氏辅协文王。文王得到上天赋予统治天下的伟大使命。后来武王攻克了商的都城大邑商，曾祭告于天说：我建都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治理人民。……时在王五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而且，跟唐兰对《洛诰》首段的考释若合符节。请看：《尚书大传》说：五年营成周。在《尚书·洛诰》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乃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佻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这里所说的是周公到洛师卜宅的情形，是营成周的开始。但作《书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把《召诰》的太保相宅与《洛诰》的周公卜宅混淆了。因而在《洛诰》序中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便来告卜，作《洛诰》。实则《洛诰》的周公卜宅，是经营成周的开始，而是在摄政七年作《洛诰》时追溯的。这里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只是为的卜宅，

首先卜的是黄河北岸的黎水，大概没有得到吉兆。于是卜涧水、瀍水之间而又靠近洛水的地方，兆把画在龟上的墨痕吃了（由坼裂而墨痕不见），又卜瀍水东边的近洛处，卜兆也把墨吃了。于是周公把地图和卜兆送给成王，由他最后决定。这时成周还根本没有经营，是很清楚的。”⑧

周公营建洛邑在摄政五年，那末，《洛诰》所说的“七年”又如何解释呢？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前所述，洛邑的规模很大，绝对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很可能开工于周公摄政五年，完成于七年。《尚书大传》和《何尊》铭文记的是“卜宅”营建的开始年代，而《召诰》、《洛诰》所记则是完工“相宅”之日，整个建筑大概用了两年时间。这既合乎情理，又澄清了“伪孔传”、苏说造成的九个月完成浩大工程的混乱。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召诰》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请看：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吉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在《召诰》里，由召公先去“相宅”，戊申那天到了就卜宅，得到了吉卜就经营，接着就派殷庶来攻位，五天就造成了。第二天乙卯，周公来了就“达观于新邑营”，随着祭郊、祭社，最后还朝命庶殷等。从文中可以看到新邑已建成了。如果说召公卜宅是新邑未建成之前，那末，由戊申到乙卯，只过了七天，其间只攻了位，周公来了怎么能看“新邑营”呢？怎么又有了郊祭和社祭呢？可以看到，《洛诰》的乙卯是在周公摄政五年将营洛

邑之前，而《召诰》的乙卯则在周公摄政七年洛邑建成之后<sup>①</sup>。

总之，摄政四年，周公在“建侯卫”的同时，“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并开始兴建城郭、宫室，以备防守；摄政五年，周公“卜宅”，并正式开工营建规模浩大的洛邑；整个建筑大概用了两年时间，于摄政七年建成后，召公“相宅、攻位”，周公郊祭、社祭，朝命庶殷。

注：

①史为乐：《西周营建成周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杨宽：《西周初期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4期。 吴泽：《洛诰史事年岁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何幼琦：《周公东征概述》，《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

②④清皮锡瑞：《经学通论》。

③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⑤参见王玉哲：《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人文杂志》丛刊（《西周史研究》）1984年4月。

⑥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

⑦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同上。马承源：《何尊铭文解释》，同上。李民：《何尊铭文解释》，《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杨宽：《释何尊铭文兼论周初开国年代》，《文物》1983年第6期。

⑧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学院预科部